



安 县 情

概 况

农安县位于吉林省中部，地处松辽平原，隶属长春市。总面积5268平方公里(791万亩)，辖10个镇、21个乡。人口超百万，汉族居多，少数民族仅占百分之二。县城居中偏东，在长春市北60公里。长白铁路、图乌公路贯穿县境南北。

地形由西向东逐渐沉降，是个波状起伏的平原台地。西部为连锁湖泊区，有五大泡塘，以簸箩泡子为最大，南部为松辽平原分水岭北坡，东部是伊通河谷地，北部是松花江谷地，西北部为沙土高台地，靠近“八百里旱海”的边缘。

自然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草原特色，是森林与草原的过渡边缘地带。清代开垦之初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水草丰盛，野生动植物颇多，仍有“棒打獐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的景象。境内气候干旱，多大风，县西北六乡镇是风砂干旱区，春播后，种子、肥料

和表土常被大风刮走，十年九春旱，威胁适时播种。近年采取玉米催芽坐水早种，成为重要增产因素之一。境内地处“九河下梢”，伊通河、新开河遇丰水年洪水泛滥，沿河常遭水患，形成九大涝区。既旱又涝，是农安的一大特点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树木被砍伐殆尽，森林覆盖率只剩0.59%；到1987年森林覆盖率达8.9%，全县农田基本实现林网化。自古以来，除沦陷时期尚未修成的一座太平池水库外，再无水利工程可言；到1987年，除沿江河筑有坚固的堤坝外，拥有大中小水库和塘坝64座，排灌站45座，电机井1181眼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奋斗，付出高昂的代价，进行植树造林，防风固沙；兴修水利，防洪治涝，养鱼种稻，彻底改变了农安一穷二白的旧貌。平原林网和水利工程已经发挥了效益，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。

农安幅员辽阔，土地资源较丰富，仍保有一定数量的草原荒地，适宜农林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。由于境内多黑钙土，又有“六万

（公顷）风砂九万洼，洼中五万碱巴拉”之说，总体说土地较瘠薄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低，但适于种植甜菜、葵花、烟麻和薯类等经济作物。农安不仅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，还盛产油糖薯烟麻瓜菜。每年向长春市提供大量的农副产品，向国家交售的粮油糖和猪禽蛋，在全省均占重要地位，其中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猪数量一直名列全省之首。矿产资源较贫乏，已知储有大量的油母页岩，砂砂已开采多年，石油、天然气储量不明，尚待开发。农安的能源，煤炭全靠外地供应。1951年开始接受电网供电，1985年达到全县所有村屯通电。

农安历史悠久，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活动于此。从城郊伊通河畔左家山遗址的考古挖掘测定，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。据有文献可考，较早集居于这一带的是夫余族，东晋初，今农安县城是夫余的后期王城，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。夫余族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，种五谷，善养牲，亦农亦牧，说明此地当时已经有了农牧业。唐时，今农安城是渤海的西部重镇扶余府。北宋时期，是辽的军事要地黄龙

府。黄龙府城内聚居有汉、契丹、女真及其它许多少数民族，各族语言不通，以汉语共同交流；各族人民多来此交易，城内有较大的贸易市场。辽朝篤信佛教，八角十三层辽代佛塔至今仍屹立在农安城内。这里是通往辽首府上京临潢府和东京辽阳府的交通要道，辽金曾在此发生过多 次较大战事。元代今农安县城是开元路的路治所在地，今农安县的万金塔是元在东北地区的驿站中心。直到元朝后期，黄龙府城被废弃，成为蒙古族的游牧地，荒芜达三百年之久。

清乾隆年间，郭尔罗斯扎萨克开放其以南的游牧地，先后有山东、河北一带民户迁入境内开垦。到嘉庆、道光年间，来此垦荒民户日增，已形成三里一小屯，五里一大屯，阡陌纵横，田园相连的景况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商品交易增加，出现集市贸易和手工业作坊，逐渐形成集镇。农安城是长春厅管辖内最大的集镇，农安乡境内同时还有靠山屯、哈哩海城子、高家店、万金塔、巴吉垒、架格苏台等小集镇。到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农安方始建县，县城和伏龙泉成

为集市贸易中心，除附近地区外，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内蒙商队常来此交易。后由于中东铁路和四洮铁路通车，商业贸易中心逐渐转移，贸易范围显著缩小。清末，左右农安经济形势的工农业只有烧锅、粮栈、杂货业和当铺等。外销商品以粮食为大宗，多销往长春、沈阳、营口、大连等地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到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农安县知县李澍恩对农安的吏治进行某些革新，他兴办教育，创立师范讲习所；提倡实业，创办农事试验场、工艺讲习所和奖励民众植树造林，对开发农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民国时期，家机布工业兴起，产品外销附近各地。后由于外国商品大量涌进，日货充斥农安市场，当地工业产品受到排挤，工商业开始衰落。加之土匪猖獗，社会治安紊乱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影响经商贸易，经济每况愈下。当时政府虽派大批军队常驻农安境内，亦无济于事。地方政府为筹集兵饷，频征各种苛捐杂税，人民负担沉重，兵匪勾结骚扰，人民苦不堪言。

东北沦陷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粮食和物资，强迫农民送交“出荷粮”，粮食和农副产品被搜刮一空。对生活必需品则实行“配给”，人民所得微乎其微，生产生活极度困难。由于日伪实行物资统制，使工厂大半停工，商店货物奇缺，城乡经济萧条冷落，多数人穿更生布，吃糠咽菜。日伪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严加统治外，通过抓劳工，要“奉仕”，派官车，对劳动力资源进行统制和掠夺，残酷地奴役中国人民。

1945年“八、一五”东北光复后，人民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不久，境内土匪蜂拥而起，到处烧杀掠夺，大部分土匪投靠国民党反动派，充当其“地下先遣军”。兵匪盘踞在县城、集镇，吃住在工商店铺，每日大摆酒宴，将工商业户吃干拿净，纷纷停业倒闭，城乡被蹂躏得遍体鳞伤，民不聊生。

1945年11月15日，中共吉林省工委派县长刘德彪到农安接收，第一次建立起人民政权，开始肃清匪患，安定民生。不到两个月，由于混进农安独立八团的坏人叛变，县长刘德彪等遇

难，县城被叛军盘踞，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
从1946年到1948年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，农安地处国民党军队与人民军队双方军事割据的中间地带，土匪乘隙骚扰，与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向人民进攻。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长春、农安两县人民，在中共长农县委的领导下，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。两县干部和地方武装，以三盛玉拉拉屯为根据地，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；发动群众剿匪反霸，扩大解放区，建立人民政权；筹粮筹款，出担架做军鞋，参军参战支援前线；配合主力部队，三出三进农安县城，三打伏龙泉，三打靠山屯，支援人民解放军三下江南作战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，许多先烈为农安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1947年10月18日，农安县城终于获得解放。

1947年冬到1948年春，长农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。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房屋和车马，彻底摧毁了封建压迫与剥削，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。经过组织起来，换工

互助，开展大生产运动，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。在城镇贯彻执行工商业政策，使被摧残殆尽的民族工商业得到复苏。开始建立国营工厂和贸易商店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，在城乡组建供销合作社，到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全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阶段。1952年到1956年，完成对农业、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农副产品充足，价格低廉；工业产品满足供应，商业部门送货下乡；文化、教育、卫生事业发展，社会治安状况良好，工农业总产值递增率将近10%。农民群众称50年代的互助组、初级社是“黄金时代”。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，由于1958年搞“大跃进”和“人民公社化运动”，在“一平二调”、“共产风”等极左路线干扰下，干部虚夸风和强迫命令风盛行，加上自然灾害，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，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比“一五”期间下降5.5%。人民生活有所下降，生活必需品短缺，出现三年暂时困难时期，但是全县人民艰

苦奋斗，修复了太平池水库，新建成共青团、头道岗两座中型水库，为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1962年贯彻执行中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部分地调整了某些生产关系，有限制地放宽了一些政策，对在“大跃进”中“一平二调”的财物逐级进行退赔，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，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开始好转，工农业生产年均递增率又上升2.6%，各项事业进一步得到发展。特别是在兴修水利、植树造林、农业机械化等方面，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。1966年开始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，造成各级领导班子瘫痪，极左思潮充斥所有领域，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，使回升的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再度受挫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广大干部和群众虽然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，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仍取得了一些成就。全县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开展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，出现了以治涝为主的前岗公社林路沟综合治涝的典型，以防风固砂为主的三盛玉公社农田防护林建设典型，以“四旁”绿化为主的烧

锅公社林业建设典型。西北地区打了3000多眼电机井（因管理不善和出水量小一部分报废），修建松城电灌站和几十所小型电灌站和电排站。借助长春市“五七”战士力量，同厂矿企业挂勾，办起一批社办企业，这是发展农安乡镇企业的基础。尽管工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提高，并注入一些新的科学技术，“十年动乱”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，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。

1976年10月，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，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经过拨乱反正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在企业中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，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获得突破性进展。

农业接着中央“决不放松粮食生产，积极发展多种经营”的方针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，废除了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人民公社体制，采取了粮油糖、农林牧、农工商综合发展经营的方针，全面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

为标志的农村第一步改革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布局。党的政策顺应民心，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推广科技，普及良种，化肥、农药、薄膜等使用量均有显著增加。农业生产一靠政策，二靠科学，三靠投入，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根本变化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，强调“以粮为纲”，限制经济作物，作物单一，结构不合理，全县粮食总产一直徘徊在30万吨上下，群众称其为“老二八”（即28万垧耕地，产28万吨粮食）。1983年调整了作物种植布局，扩大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，粮食总产量猛增到90万吨，同时油料增到4.7万吨，甜菜增到17.5万吨，薯类增到20.7万吨，农业总产值达5亿多元，比1978年增长4倍。农民群众称之为又一个黄金时代。从1979年到1986年多种经营年均增长速度为16%，其中林业为16.38%，牧业为18.74%，副业为15.64%，渔业为16.08%。林牧副渔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23.7%上升到32%。1987年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六分之一多，人均牧业创收高于全国、全省平均水平。全

县具有规模经营的养猪专业大户近千户，多者一户年均养猪 100 多头。羊鹅兔等草食动物发展迅速，全县农村兴起养鹅热，万金塔乡的羽绒市场成为全国较大的羽绒市场之一。林业到1987年造林保存面积达89万多亩，森林覆盖率为8.9%，全县已基本形成农田林网化。在防风固砂、改善农田小气候方面已经见效，被国家评为“三北”防护林一期工程建设先进县和平原绿化先进县，被吉林省命名为林业模范县。1980年落实渔业所有权政策以后，兴起个体养渔业，大小泡塘被开发利用，全县已养殖水面8000多公顷，占可养殖水面的61%。1987年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投资援建中国wFp2814项目（淡水精养鱼），在龙王乡、三岗乡、黄金乡、烧锅镇、太平池水库等地设精养鱼池，总面积5000多亩。全县产鱼较多的簸箩泡子，丰水年达二、三百吨，以鲫鱼有名；太平池、共青团、头道岗、两家子等水库养殖的多是鲢鱼和鲤鱼，太平池水库年均产鱼百吨左右。

农业产业结构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转向多元化、多层次综合发展，部分农民开始转向

农村其他行业的经济活动。乡镇企业出现乡办、村办、联户办、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动，工商建运服五大行业一起上的势头，形成“四轮驱动，双轨运行”的发展模式。1978年乡镇企业仅有541个，总产值3000多万元，到1988年，仅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就达到1300多个，个体和联户企业发展到3万多个，总产值达到6.5亿多万元。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经济总产值的46.8%，税金占全县财政收入总数的三分之一，连续六年被评为省市乡镇企业先进县。从业人员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，1978为9.2%，1986年上升到31.3%，1988年为44.4%。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加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1978年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33.2%，1986年上升到65.3%。自1980年以后，粮油糖薯和生猪等农牧产品的商品率，由1978年30%上升到60%以上。1987年农村社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一倍，其中建运商服所占比例，由1978年的年均增长23.9%上升到39.7%。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，大批农村劳动力务工经商，使全县

原有2个镇增加到10个建制镇，实现54个城乡贸易市场。

工业生产经过体制改革，实行厂长负责制，扩大企业自主权，推行和完善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，增强了企业活力。在坚持以名优产品为龙头，以骨干企业为依托，先后有8家企业和外地名牌生产厂家实行联牌生产，有20多个企业同外地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联合，通过引进技术、设备、人才，建立不同形式的经济协作关系，靠大中型骨干企业，靠科研生产联合体，开发当地资源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，形成饲料、鹅业、糠醛、葵花、粉丝等5个农副产品加工系列。1986年工业总产值同1978年相比，年均增长10.7%，若把个体加工业计算在内为1978年的4.1倍。1986年实现利税2000多万元，利润超百万元的企业有县制药厂、植物油厂、炼油厂、饲料公司等。1949年全民企业仅有印刷、造酒两家，到1987年发展到33家，加上集体和个体企业共2000多家。全县已形成石油、食品、化工、机械加工、建材、纺织、造纸、木材加工、塑料制品、

印刷、电气电线、服装皮革等工业门类。主要产品有棉布、服装、鞋、绵白糖、啤酒、白酒、食用植物油、乳制品、配混饲料、机制纸及纸板、塑料制品、柴油、重油、液化气、人造板、红砖、水泵、中小农具等。但是农安工业由于素质差和亏损的企业较多，名优和出口产品少，经济效益还不高。全县公路总里程900多公里，比1949年增加4.3倍，其中晴雨通车公路300多公里，柏油路由零增加到近300公里。1949年全县仅有货运汽车8辆，1978年有客货运汽车500多辆，1987年增到近900辆，其中私人汽车占半数。全县拥有各种机动车9000多辆。1986年交通部门所属单位完成货物周转量2.6亿多万吨公里，是1949年的2000倍，是1978年的20倍，年均客运量百万人次。邮电业务总量1986年比1978年增长2.2倍，私人安装电话由1978年的零发展到1987年的500多台。1987年运转邮电社会总产值占全县社会总产值的5.1%。

1979年以后，国家逐步对流通体制进行改革，全县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，集体商业为

辅，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多种经济形式、多渠道流通、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业结构。各种经济类型全面发展，流通渠道增多，零售额竞相增长，个体经济零售额的增长最快。1978年全县商业饮食服务业零售网点发展到4000多处，平均262人就有一处零售点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亿多元，比1978年增长13.1倍。1986年全县31个乡镇均开辟有贸易市场，集市贸易成交额达3000多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20倍，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0%。出口产品逐年增加，1982年出口总额4000多万元，有粮油、土畜产品、工业品、手工业品等品类，以出口玉米为大宗，新增加了羽绒产品，橡皮泥出口多年，经久不衰。

新中国成立以前，农安是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县份，素有“土农安”之称。农安除土平房、土墙、土路外，风砂大，有文化的人少，文盲多，疫病流行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项事业发展很快，教育和卫生事业在全省是较好县份之一。1981年科技体制改革以后，科技队伍不断扩大。县科协组成15个学会，31个乡镇普遍建立起科普协